

话说“统计死”

吹事员

最近，网络媒体转载了《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的孙经先先生的文章，称：我国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是重大谣言。孙先生经过整整三年的调查研究，得出结论，人口统计中那几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是在当时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发生城乡人口大迁移时，户籍出现了重大的虚报、漏报造成的，只是统计数据的异常，与当时中国人口的实际变化无关，更与“人口非正常死亡”无关。

孙先生的文章说：“造成 1960—1964 年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不考虑自然增长）减少了 3394 万（其中 1162 万重报虚报户籍人口被注销、750 万死亡漏报人口被注销、1482 万漏报户籍人口）。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大量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些减少都仅仅是统计数据数字的减少，并不是这一时期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这些减少与这一期间我国实际人口的变化没有关系，更不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扼要地说，在 1959 年底以前，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 3000 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 1162 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加之有死亡漏报的现象（750 万人），就使得 1959 年全国人口基数变大。随后，我国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在 1961 年—1963 年这三年因为精简市镇人口而迁出市镇并办理了迁出手续的人口数合计 2325 万人，但是同期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合计却只有 948 万人。这两个数据出现了 1377 万人（吹事员按：此数字与上面提到的 1482 万人漏报户口有差异）的差额。也就是说，1959 年前大量的农民招工进城时有城乡双户口（按户籍统计，人比实际多了），1960 年后精简返乡时又没户口（按户籍统计，人比实际少了），此时一统计，人口比 1959 年少了 2644 万（1162 万+1482 万），再加上注销了 1959 年前 750 万死亡未报的户籍，一来一回前后相差 3394 万。孙先生认为，这就是所谓“三千万”的真相，不是“饿死掉”，而是“统计掉”的。

我没有能力去核实验证孙先生的调查数据以及他的调研过程，但是从他的文章中，我却发现了严重的缺陷，使他的结论经不起推敲。最根本的一点是，孙先生所说的数千万人口迁出城镇到农村，与人口统计中的人口减少的数字，在年份上对应不起来。

孙先生说，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人口自然增长异常减少中最突出的是 1960 年比 1959 年净减 1000 万人。按孙先生的说法，这 1000 万人中的绝大多数

应该是因为销了城镇户口，又没在农村入户造成的统计数字上的减少。那么，1960年有多少城镇人口变成了农村人口呢？孙先生没有明说，他只是说“在1961年—1963年这三年因为精简市镇人口而迁出市镇并办理了迁出手续的人口数合计2325万人，但是同期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合计却只有948万人”。显然这不是1960年人口净减1000万的原因，因为1961年—1963年间发生的情况不能用来解释1960年的问题。不知孙先生能不能明确地告诉我们，据他的研究，1960年净减少的1000万人到哪里去了。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孙经先先生的文章中，给出了1956年—1959年和1961年—1963年市镇、农村户籍人口变化的数据表格，却唯独没有他认为问题最突出的1960年的数据。这是疏忽所致还是刻意为之？为什么？

在1960年数据缺如的情况下，孙先生的文章在一个地方提到“1960年—1964年户籍人口异常减少的社会原因”，他只是说：“我国大规模精简职工、减少市镇人口的工作始于1960年9月，基本结束于1964年，其中主要是在1961—1963年这三年进行的”。“始于1960年9月”，会造成当年1000万净减人口？何况他本知道减少市镇人口的工作主要是在1961—1963年这三年进行的。他这样写，给人一种想采取模糊策略，用后几年的数据，笼统地解释关键一年严重问题的印象。

此外，孙先生的文章中还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说，据他研究得出的数字，我国1959年底的户籍统计人口总数中，存在着应注销户籍人口1912万，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2.84%。又说，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虚假户籍人口1912万的户籍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被注销。这里有两个问题，一、“1960年前后”，“前”就是1959年或更早，不可能注销1959年底的虚假户籍；“后”是那几年？为什么不说细一点？这还是用“前后”、“几年”夹带“1960年”的模糊概念；二、如果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注销了大量虚假户口，那么统计上的人口的异常减少就不该出现在1960年，而是出现在1964年。可实际情况却是，已经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1964年中国人口明显增加了。这恰恰说明，在那些年，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虽然对人口统计有影响，但不是造成人口异常变化的主要原因。如果有相当部分的虚假户口是在1964年才注销的，那么，孙先生关于1961—1963年间大量人口在城镇销户，又未在农村入户，造成户籍统计数据异常的说法，就捉襟见肘了。

孙先生在文章结尾说：“历史的教训值得深刻汲取；但是，片面地、无端地夸大非正常死亡人数，并不是严谨的学风，更无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坚定今日的前行方向。”这话说得恳切。但是，用有严重缺陷的调查结果来指责“片面地、无端地夸大非正常死亡人数”，同样也不是严谨的学风，无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孙先生为此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三年，让我有几分钦佩。

遗憾的是，苦劳不等于功劳，做学问、搞研究的人不得不经常面对这样的尴尬。